

Aalborg Universitet



**AALBORG
UNIVERSITY**

Li, Xing; Zhang, Jiu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ublication date:
2015

Document Version
Publisher's PDF, also known as Version of record

[Link to publication from Aalborg University](#)

Citation for published version (APA):
Li, X., & Zhang, J. (2015).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2015(2), 81-99.

General rights

Copyright and moral rights for the publications made accessible in the public portal are retained by the authors and/or other copyright owners and it is a condition of accessing publications that users recognise and abide by the legal requiremen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rights.

- Users may download and print one copy of any publication from the public portal for the purpose of private study or research.
- You may not further distribute the material or use it for any profit-making activity or commercial gain
- You may freely distribute the URL identifying the publication in the public portal -

Take down policy

If you believe that this document breaches copyright please contact us at vbn@aub.aau.dk providing details, and we will remove access to the work immediately and investigate your claim.

中欧博弈新常态与国际安全 格局转型*

【丹麦】李形 张久安

【内容提要】中国和欧洲正在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博弈的焦点。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国际格局力量对比正在经历持续且深刻的调整，中欧大国的安全博弈也随之呈现出新的常态。相应地，如何准确把握中欧大国关系中安全博弈的新常态以及中欧博弈对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影响，并加以前瞻性应对，是中国外交在保障国际安全以及维持未来大国协调进程中必须考量的问题。中国和欧洲在大国安全关系持续协调中的“软博弈”（即国际安全的规范与价值的持续碰撞）与角色互换进程中的“硬摩擦”（即中国与欧洲在世界主导权结构中地位与角色的升降变化），共同构成了国际战略格局转型期中欧安全博弈的新常态。理解中欧大国博弈新常态之于国际安全研究则需要透过“‘相互依存式主导权’视阈下的国际社会化”这个两者结合的理论棱镜。在安全领域，中国对欧洲的外交也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应当引导中欧关系进入国际安全规范重塑和机制建设进程的大方向。

【关键词】新常态；中欧博弈；国际安全；相互依存主导；国际社会化；规范重塑；制度建设

【作者简介】李形，丹麦奥尔堡大学（Aalborg University, Denmark）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DIR）主任，教授；张久安，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邮编：100875）。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15.02.005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5）02-0081-19

* 笔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审稿专家的评审和建议，文中疏漏由作者承担。

一 问题的提出：转型期的中欧大国博弈

大国间的竞合博弈是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变量。欧盟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政治集团，早已成为当今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崛起的加速和持续，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已经表明，中国正逐渐从地区性的大国成长为全球性的大国。^①从体量上，中国和欧洲正逐渐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两大战略力量和牵动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中国和欧洲正在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博弈的焦点。^②具体来说，中欧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应对索马里海盗等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应对伊朗问题、苏丹问题和乌克兰危机等地区冲突与全球热点问题中的合作与纷争，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世界和平、国际秩序发展的基本走向。当前，这种具有全球影响的双边关系被置于世界格局加速转型的大背景之下。

中国外交学院的王帆教授认为，“所谓转型期是指国际格局出现结构性变化之后，始终没有相对定型和固化，而是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与调整之中。旧的力量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力量平衡尚未形成，世界继续向着不确定性的方向变化发展。”^③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当前大国关系进入力量对比和角色调整的转型期，既是指国际关系长期演进所带来的结果，又是在强调其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或急剧的转变。因此，当前的世界局势正处于历史性变化的过渡时期，是一个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转变的过程。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催化了这个质变进程。所谓质的变化指的就是国际关系结构的大变化。正如崔立如所言，“国际关系正在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④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通常将世界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政治力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形态与相对均衡的对比态势称作国际格局，国际格局包括政治、经济、

^① 尽管西方学术界对中国能否最终成长为全球性的大国仍存在争议，但西方学术界自2002年开始探讨中国崛起，到2010年前后普遍认为中国已经崛起，确是不争的事实。关于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崛起、中国将成为全球性大国的质疑，参见Susan L. Shirk,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关于中国崛起以及崛起的中国与世界体系、其他大国的关系和影响，参见[丹麦]李彤主编：《中国崛起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林宏宇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

^② 在2013年年底中欧第16次战略峰会所发表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成为中欧合作的新期许，被置于首要的位置。该《规划》指出，“中欧作为多极世界的重要力量，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繁荣与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参见《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1/23/c_118265413.htm。

^③ 王帆：《战略转型期的中国外交战略规划》，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第1-15页。

^④ 崔立如：《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的若干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1期，第1-3页。

安全以及军事等诸多领域。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权力结构中的消长变化、关系态势中的敌友认知以及联系模式中互动方式的变化，极有可能引发世界态势走向的全局性变化。胡宗山指出，“格局这一概念更加强调国家之间综合实力和战略目标的对比”。^①就中欧关系而言，作为具有全球影响的两大行为体，中欧大国博弈对未来国际格局、特别是国际安全格局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关注。这也是笔者在此使用国际格局，而非国际秩序、国际体系等概念的原因。

既有的国际安全格局诞生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先后形成了两大相对稳定的国际安全结构，分别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以欧洲均势为主导的国际安全结构和雅尔塔体系中以美国独霸为主导的国际安全结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雅尔塔体系日益衰落，国际格局由美苏争霸对立的“两极”冷和平进入到“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继续深入，中国的持续崛起，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主导的“一超”国际安全格局开始受到各个方面的严峻挑战，大国博弈形势的日趋复杂导致了国际安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导致了美国主导的西方主导权结构的松动，西方对世界秩序“合法性”的主导权则越来越依靠来自新兴国家的制度与价值供给维持。^②世界范围内的主导权日趋朝向相互依存式方向发展。由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世界秩序合法性与权威性的结构更是亟须改革。中国学者徐进强调，“‘一超多强’，这一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实力结构也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开始趋于转型”。^③简言之，随着世界主导权结构的变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有所削弱，它不可能作为单一的主导权力量而解决全球化时代世界所面临的全部安全问题与挑战。美国对其世界主导权的护持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西方大国（如欧洲）的帮助，同时愈加需要借重中国以及新兴国家合力的制度与价值供给；而中国等新兴国家也纷纷从各自的立场、利益出发，主张多极化的世界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而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导下的国际安全格局则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国际战略格局的大变革和大调整持续相伴的是国际安全现实问题的复杂化与多元化。首先，由大国博弈所引发的传统安全威胁并未消失，以乌克兰危机代表的地区和局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地缘安全局势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此外，传统的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如伊朗核危机与叙

^① 胡宗山：《国际政治学基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② [丹麦]李彤、奥斯卡·加西亚·奥古斯丁：《相互依赖式主导权：透析“第二世界”和金砖国家的崛起》，崔洋、林宏宇译，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1-117页。

^③ 徐进：《在“韬晦”和“有为”之间：中国在保障国际安全中的作用》，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4期，第84页。

利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且持续发酵,严重困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其次,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持续升温,并与传统安全因素交织在一起,挑战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同时,以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贫穷饥饿、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粮食危机、能源资源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流行等为代表的全球性问题,不但未能得到全球解决,甚至有加剧紧张的趋势。上述复杂、多元的安全问题与世界经济的艰难复苏、欧债危机的持续影响相叠加,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国际安全的紧张局势,为大国间的安全博弈与协调带来了挑战。就中国和欧洲的博弈而言,各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多个方向,涉及不同领域,包含多种因素。但是,就安全威胁的本质而言,都呈现出经济与政治、安全相互渗透,国内与国际安全相互影响的复合型特征。而就安全威胁的中欧应对而言,国际安全格局转型期的大国之间竞争博弈,利益矛盾相互交织,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复杂了中国和欧洲所面临的安全环境,中欧之间安全竞合博弈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在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欧洲外交的战略收缩与退守周边地区的外交思路,将欧盟成员国的资源和注意力吸引到了西亚、北非、中亚等欧盟视域中的“大周边地区”。而随着中国外交的“西进”战略^①日渐成型以及中国希冀在地区热点问题(如西亚、北非动荡)中发挥日益积极的作用,中国和欧洲在世界主导权结构中的冲突与碰撞将会日趋强烈。

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欧间的往来交流日益密切,利益融合明显加深。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如当下肆虐全球的埃博拉病毒)的传导性、扩散性日益增强,中欧在国际安全领域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由此看来,国际安全格局演进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为中欧大国博弈设定了基本国际环境和约束条件,也凸显了中欧合作保障国际安全的重要意义,为深化中欧安全合作创造了机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欧之间在权力结构、关系态势和模式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简单来说,中欧之间存在权力的消长变化,即中国崛起而欧洲相对衰落,世界重心逐渐从欧洲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转移;^②中欧之间的关系态势则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局面,中欧之间的相互依存、伙伴关系大于分歧与冲突;而中欧之间的关系模式则是日趋复杂化的“软”、“硬”较量、博弈与持续互动。

因此,在国际格局转型与国际安全形势日趋多元、复杂化的大背景下,中欧大国博弈在国际安全领域已经或即将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在学理上,如何理解中欧安全博弈的新特点?在理论的指引下,应对中欧安全博弈的新特点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安全格局的转型,还需要跨越哪些“瓶颈”?这些问题都值得中国国

^① 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载《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7日。

^② 关于世界权力重心逐渐由欧洲向东亚转移,参见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4-21页。

际关系研究者们思考。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对中国安全博弈缘起的历史回顾、对当下中欧安全博弈困局的认知,勾勒出中欧安全博弈的新特点,即“中欧安全博弈新常态”。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从国际格局演进或曰世界主导权结构变迁的视角,探讨“中欧博弈新常态”背后的理论支撑,即“相互依存式主导权”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框架的指引下,探讨中欧博弈新常态对国际安全格局转型的影响。最后,立足于中国,通过社会化理论的视角,提出中国外交应通过规范重塑和机制建设的政策来应对“中欧博弈新常态”与国际安全格局转型。

二 中欧安全博弈:缘起、困局与新常态

探寻中欧安全博弈的缘起,离不开中国和欧洲在大国成长的历史进程中对不同发展道路与发展阶段的探讨。

(一) 中欧安全博弈的缘起与困局

就欧洲而言,近现代国际秩序演进的历史就是欧洲的成长之路。从国际秩序的角度看,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显示了欧洲从世界体系的建立者到主导者再到重要参与者的兴衰交替前行的历史进程。而以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为参照,中国的大国崛起历程则是从体系的旁观者到参与者(融入者)再到重要参与者的融入与改变的历史进程。^①就中国的角色定位而言,刘丰指出,“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进程看,中国从现有体系的批判者、抗拒者和革命者逐渐转变为参与者、受益者和维护者”。^②而中国自身角色定位变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与世界主导权结构中实力、地位提升的过程。

反观现实的中欧关系,在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迎难而上的中欧关系面临着经济领域的“摩擦与平衡”和政治安全领域的“接触与博弈”两大困局。就经济领域而言,尽管欧洲在同中国进行经贸往来、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过程中长期存在着“小心提防”的复杂考量,^③但中欧之间经贸合作“开始早,成果大”的互利合作以及经济结构上的互补优势,建构了中国和欧洲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或纷争与双方政治外交领域双向促进或紧张对峙的密切联结。中欧经贸关系中出现的矛盾和分歧需要双方继续在经贸往来的摩擦中实现再平衡。^④

①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9页。

② 刘丰:《新的国际体系下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载《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第135页。

③ 众所周知,欧洲一直是中国遭遇反倾销诉讼与调查的主要来源,而关于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辩论以及围绕欧盟对华技术出口壁垒的政治,一直是中欧大国博弈较为集中的问题领域。

④ 举例说来,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的主要诉求也是要实现经贸的“再平衡”。

然而，就政治、安全领域的中欧大国博弈而言，合作发展与相向共赢正成为中欧关系的主旋律。中国和欧洲在地缘政治上互不构成安全威胁，两者之间的安全竞合博弈也因此不同于中美之间的地缘战略互疑。^① 诚如王正绪所言，“中欧之间在国际政治中不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双方不视对方为战略威胁，双方之间没有领土或历史争端”。^② 清华大学史志钦教授更是直言，“欧洲有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够与中国深入合作的发达经济体”。^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处于主导地位的欧洲被认为是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的代表，^④ 欧洲与崛起的中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历史道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有待于中国与欧洲再进一步的政治接触与动态博弈中加以解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欧洲的博弈不同于欧洲与其他大国的地缘政治与安全博弈。以新近发生的乌克兰危机为例，乌克兰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摇摆经由传统地缘（北约不断地挑衅性东扩的结果^⑤）和历史政治因素的放大（俄罗斯与西欧的传统不信任），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构成了政治和安全领域的隔离而非接触；而中国和欧盟之间安全领域的合作与纷争则事关国际秩序的规范、价值与制度在国际格局转型期的博弈，需要在进一步的政治接触中加以妥善解决。但是，同时中国和欧洲也看到了双方对乌克兰事件的不同认识和对俄罗斯实行制裁上有着巨大的分歧。中国不但拒绝制裁俄罗斯，反而加快构建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大与俄罗斯的贸易。这也恰恰反映了中欧在国际秩序的规范、价值与制度方面在国际格局转型期的博弈中此起彼伏的状态。

在国际安全领域，中欧之间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⑥ 也因此更凸显了中欧双方在保障国际安全中的作用和责任。与此同时，作为中欧关系进程中的动态特征，世界主导权结构中升降变迁的“硬摩擦”与国际安全规范领域的“软博弈”

① 关于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参见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② 王正绪：《全球性但不失掉自我的大国》，载《领导文萃》，2014年第3期（下），第29页。

③ 史志钦：《稳定而成熟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5524?page=1>。

④ 更重要的是，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本身以及欧盟都被视为地区、全球事务处理方式以及大国外交行为模式的创新，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进一步说，欧盟的建立就是为打破“以权力来调节国家间关系”的传统模式。

⑤ 近来西方学者和媒体对俄罗斯—乌克兰的危机事件争论不休。一些资深的现实主义学者坚持这种观点，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1769/john-j-mearsheimer/why-the-ukraine-crisis-is-the-west-s-fault>。基辛格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但是也有反对者认为他完全误解乌克兰，<http://www.worldaffairsjournal.org/blog/alexander-j-motyl/kissinger-misunderstands-ukraine>。

⑥ 在笔者看来，中欧之间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在于中欧不存在中美之间的地缘战略互疑，不存在相互之间的军事竞争和势力范围的挑战，不存在由于中国崛起所引发的“结构性安全矛盾”等。

的相互交织，为我们准确把握中欧安全博弈的缘起和现实，破解国际格局转型期的中欧安全博弈新常态提供了契机。

（二）中欧安全博弈的新常态

如前所述，国际格局转型期的中欧安全博弈的战略环境、利益格局和互动态势都面临着新的变化。一方面，中欧之间在全球战略问题上的分歧依旧，维系大国协调的良好态势离不开中欧之间的“软博弈”。作为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中欧安全博弈中蕴涵着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和演变，影响着国际安全格局的转型。中欧之间在国际安全领域合作愿望不断增强，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扩大，但在保障国际安全、塑造未来国际安全格局的过程中也日益凸显出结构性的矛盾。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结构指的是“用于描述某种事务各个组成要素的分布状态的概念，是分析某种事务的内在运动规律的工具”。^①

具体到中欧大国博弈之中，中欧之间在全球战略问题上的分歧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有被放大的趋势。中国和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都是多极化世界的积极倡导者与推动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欧洲对于多极世界的构想存在着战略分歧。^② 以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认知为例，中国国家领导人一再对外宣示，推进世界多极化旨在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最终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③ 而欧洲特别是法国对多极化世界的构想与推动，^④ 虽然也有改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愿望，但更多的是为了平衡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希冀联合的欧洲能够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⑤ 而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权力的重心东移，欧洲自身在多极世界中的定位也在发生着微妙

^① 张丽：《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130-140页。

^② 与此同时，囿于立场、视角与使用概念的不同，中国和欧洲对未来国际安全格局走向以及塑造国际安全格局理想模式的基本路径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分歧。这些分歧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则有可能成为中欧安全博弈的战略思想隔阂与障碍。

^③ 参见房乐先：《中国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战略判断：演化轨迹及其特征》，载《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0期，第70-76页。

^④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更是以“反对单极化世界，倡导多极化格局”，“建设一个强大的欧洲，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作为其延续法国戴高乐主义外交政策的宣示。

^⑤ 关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对“多极化世界”的表述，俞邃曾指出，1997年5月，希拉克总统访华时便在联合声明中指出：“不断发展的中国和联合的欧洲将在新的多极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2001年1月4日，希拉克在巴黎谈到欧盟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时，表示重申法国将为建立一个多极世界而努力。2001年7月，法俄国家元首联合声明也曾提出建立多极世界格局的主张。2000年4月6日，法国外长韦德里纳访问阿根廷，发表题为《法国、欧洲与多极化》的讲话，呼吁警惕世界单极化所带来的危险，强调“我们的愿望是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参见俞邃：《世界多极化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15-20页。

的变化。^① 诚如王义桅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受美国重返亚洲、欧债危机刺激,欧盟深切感受全球权力重心东移,战略思想不再是追求成为多极世界的一极,而是在中美间博弈,试图扮演设立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的‘中介’。”^② 由此看来,中欧在全球战略问题上分歧依旧的同时,也凸显出了在世界主导权结构中地位、身份升降的矛盾。^③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中国和欧洲在国际格局中关于世界地位的竞争和矛盾也在上升,中国和欧洲的安全博弈意味着新一轮的大国关系协调、磨合与盘整。^④ 而这种安全博弈更多地体现在规范构建与重塑的层面,而不是地缘政治的潜在冲突与国际安全的战略对抗,因此可以被称作“软博弈”。

就欧洲而言,现代欧洲对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使其摸索以政治为导向、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目的是通过建立区域政治和经济的合作与相互依存,从根本上铲除欧洲大陆战乱频发的惨痛历史。而欧洲一体化的成功、欧盟的建立赋予了欧洲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规范性权力;这体现为欧盟作为地区一体化,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的新安全局面开拓者的合法性。^⑤ 欧盟与国际体系互动的主要方式是培育和施展其“民事、文明与规范的力量(normative power / civil power)”,这说明欧盟对于国际规范的内化与习得程度较高。加之现行的国际规范体系的创制大多有欧盟及欧洲发达国家的参与,因此欧盟也就成为了现行国际主导价值观的主要维护者和推广者。正如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所指出的,“欧盟必须是一个价值的联盟。这是我们在世界上的突出

^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盟所代表的现代欧洲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在全球经济、金融、贸易体系中的实力以及在全球经济、政治与安全治理结构(特别是世界主导权结构)中的作用和地位。然而,自2009年10月以来,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导致了欧盟的经济衰退。

^② 王义桅:《中欧合作有三大使命 中国梦欧洲梦共促世界梦》,中国网,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4-03/24/content_31879160.htm。

^③ 关于中欧在世界主导权结构中身份与地位的升降变迁,详见本文的第三部分——理解中欧安全博弈新常态:“相互依存式主导权”视阈下的社会化理论。

^④ 清华大学刘江永教授曾指出,“引起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往往是世界‘老二’的易位”。参见刘江永:《国际格局演变与中国周边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第4-24页。在笔者看来,中欧安全博弈的竞争与磨合发生于世界权力的中心由欧洲向东亚转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和欧洲在既有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主导权结构中的地位与角色存在一个“互换”的过程。与此同时,阎学通教授也曾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始终是世界中心的一部分。美国作为世界中心一部分的事实不仅在今天得以维持,而且非常可能将继续维持20年……真正决定世界中心转移的因素是欧洲与东亚实力的相对涨落”。参见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4-21页。

^⑤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欧洲经济的艰难复苏,欧盟国家中出现了一股“反一体化”、“再国家化”的潮流,这在某种程度上挑战了欧洲长期以来所具有的规范性权力。

价值，是欧洲在世界上的软实力”。^①与此同时，《里斯本条约》第2条也注明，“欧盟的目标是在世界上推广和平、价值观及人民福祉”。欧盟学者伊恩·曼纳斯（Ian Manners）称之为“欧洲的规范性权力”，并为这种权力总结出了五项核心规范，即和平、自由、民主、法制和人权以及四项次要规范，即社会团结、反歧视、可持续发展与善治。^②

也就是说，无论世界如何变化，现代社会科学的哲学思想和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是建立在欧洲社会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演进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也包括欧洲历史上几次大革命所奠基的上述提到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全球性“普世价值”。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美国已经是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心，但这个还是以欧洲白人为统治者的国度，其核心价值观依旧是根植于欧洲的传统。欧洲的政治家和学者们也源源不断地将欧洲理论与实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从“欧洲治理”到“地区治理”“全球治理”，从“国家主权”到“超国家”“负责任主权”，理念变迁则反映出了欧洲话语权的自信以及欧洲试图利用话语权占领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在转型过程中的理念和道德的制高点。换言之，欧洲的历史性、特殊性与优越性^③赋予了欧洲范式和定义的力量，并通过各种形式将其价值观内涵与外延绝对化、普遍化，由此衍生出以欧洲为中心所建构的世界，并试图以所谓的“欧洲道路”和“欧洲模式”塑造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

由于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中欧双方在国际权势结构中的权力转移与消长变化，中欧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竞合博弈面临着权力结构中彼此角色互换的窘境。随着中国崛起势头的进一步凸显，中国的综合国力及其在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欧洲国家在双边、地区及全球事务上对中国的需求和借重也逐渐增大。中欧之间不断调整的自身发展目标与角色身份定位加剧了中欧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竞合博弈的结构性矛盾。这就构成了中欧在角色互换过程中的“硬摩擦”。

伴随着国家经济实力与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国际安全格局塑造中的影响力也得到加强。在全球安全事务中，中国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欧洲为例，近年来，在国际事务特别是欧洲周边事务与非洲事务的应对和讨论中，欧洲对中国政策走向的关注明显增多；“中国话题”曝光的频率也与日俱增。沉渣泛起的偏见、成见与“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

^① 王义桅：《中国对欧洲公共外交的使命》，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PublicDiplomacy/lilun/detail_2010_12/08/3405632_0.shtml。

^②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2 (June 2002), p. 239.

^③ 相对于美国“例外论”的普世价值表述，欧洲历史进程的特殊性与优越性是以“欧洲中心论”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力的增强和中欧双方角色、地位在世界主导权结构中“此消彼长”的结构性变化。

三 理解中欧安全博弈新常态：“相互依存式主导权” 视阈下社会化理论

理解国际格局转型期中欧安全博弈的新常态，需要从国际格局转型的权力配置以及中欧互动博弈的过程本身加以理论阐释与科学认知，并以此揭示中欧安全博弈新常态的外在环境与内生动力。换言之，只有准确理解中欧大国博弈与国际安全格局演进（权势变化）的关系以及与变动中的中欧身份定位（角色互换）的关系，才能准确理解中国和欧洲在国际安全领域大国协调过程中的“软博弈”与角色互换进程中的“硬摩擦”。作为理论视角的“相互依存式主导权”，揭示了国际安全格局演进的进程及未来方向；而国际双向社会化理论则是通过社会学的视角，聚焦了“相互依存式主导权”视阈下中欧在国际安全领域博弈与共生的互动联结。

（一）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到“相互依存式主导”的新国际秩序

现行的国际秩序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其政治基础是美苏主宰的“两极世界”及雅尔塔体制，其制度构成立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即联合国体系、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以西方国家主导权为基础建立的国际组织。在二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主导权的护持构成了当前国际秩序延续的动力。

1. 从主导权到“相互依存式”主导权

“主导权”（hegemony）^①是研究世界秩序演进、发展、持续、危机、衰退和重构的主要概念。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世界秩序的有序或无序都源自新兴力量的崛起与既有大国的守成之间的动态张力。就葛兰西主义（强调国家内部意识形态、制度和物质实力之间的互动）和新葛兰西主义（重视社会力量、国家和主导意识形态对世界秩序的塑造）笔下的主导权内涵而言，现行的世界秩序至少存在以下

^① 英文“hegemony”一词在中文文献的普遍翻译和使用是“霸权”。“霸权”的概念有其历史因缘，在中美对抗的冷战期间，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的“霸道”和中国领导的第三世界的“反霸”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虽然hegemony在一定意义上也有霸权的含义，而始于葛兰西政治理论的“hegemony”一词指的是统治阶级或一种社会体制能保持领导地位和在国家各领域保持主导权的能力。这种能力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超越阶级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价值观，也包含了统治阶级弹性和伸缩力以及不断妥协，更新和自身不断完善的素质。因此，如果超越意识形态界限，“hegemony”应翻译为“主导”“主导性”“主导权”。

四个方面危机。

第一，多边合作实现和维系的难度远远超出了自由主义者的预期，意味着现行世界秩序存在着功能性危机。现行以美国、欧洲主导的国际安全支柱已经失去了仅仅依靠西方力量、以西方主导权为中心开展全球安全治理与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以美国、欧洲等传统西方大国主导的现行国际机制已经不足以应对多样化的安全威胁。国际安全格局转型以及全球安全治理机制重建的过程加剧了中欧之间在价值与规范层面的“软摩擦”；由于现有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主导权不断遭到挑战，中国作为崛起的新兴国家，而欧洲作为通俗意义上的“世界老二”，中欧之间的角色互换，即“硬摩擦”又反作用于日渐松动的世界主导权结构。面对这一困境，中欧安全博弈的新常态亟须创新性理论的支持与应对的策略。

第二，随着多边合作问题的日益显现，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不断应对新挑战的需求逐渐提升，这意味着现行秩序存在着范围性（scope）危机（见图1）。就中欧安全博弈新常态而言，日趋多元且复杂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所带来的国际安全规范重塑中的“软博弈”与动态演进中的中欧在世界主导权结构中的“硬摩擦”，远远超出了即有国际安全机制与安全秩序调整的范围。

第三，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在构建一个安全且公正的世界秩序中暴露出极其不均衡的弱点。突出表现在，既有国际安全制度建设（如北约组织等），也有美国诸多的单边主义行为。这种不均衡不仅挑战了自由主义所宣传的价值，也阻碍了自由主义秩序自身调适成长的努力。其结果是，现行世界秩序呈现出了合法性的危机。学者们的共识是，在管理全球问题的过程中，主导权国家和盟国的领导权及其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合法性正在不断遭到质疑。主导权国家及其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不足以实现“历史终结论”中“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普遍史”的预言。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秩序演进中的“不民主”与“不自由”，特别是带有浓厚“跨大西洋”色彩的国际安全组织与机制，都表现出国际安全规范建构与国际安全制度设计都远远没有达到时代的代表性。

第四，随着全球权力相对性转移（从美国和欧洲转向中国和“金砖国家”），现行世界秩序正在经历权威性的危机。中国的崛起、金砖国家和“第二世界”的兴起在增强了新兴力量自身的政策制定权重的同时，也挑战了由核心国家主导的主导权结构。^①根据2010年二十国集团（G20）在韩国达成的共识，按照配额制“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将大幅度提高，都将进入前十名。尤其是中国将从以前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美国对此难以接受，但又束手无策。另外，

^① Parag Khanna, *The Second World: 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defining Global Competi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9.

中国近年来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的金额是世界银行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数额的好几倍，世界银行的实力和声誉受到沉重压力。为此，世界银行与中国协商，希望中国尽量通过世界银行来实行对非援助。由此可见，全球治理的主导权的权威、资源、经济基础和合法性需要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分享。

2. 相互依存主导权与中欧安全博弈：挑战和依存的辩证关系

众所周知，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可能的冲突和纷争是全球政治永恒的主题。以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为代表的一些悲观现实主义者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崛起大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主导权守成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①其他的现实主义者也悲观地主张，现行世界秩序的主导权结构并没有给崛起大国维护自身的利益留有太多的空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行世界秩序的规则基础以及国际制度的充分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配合了崛起国家增强其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诉求。尽管崛起大国更倾向于创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以更好地适应自身的发展和诉求，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②与此同时，其他坚定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学者主张，中国模式与非西方经济体的崛起，意味着新兴国家在国际体制内自身的发展与赶超的努力，也恰好说明自由世界秩序的强有力的伸缩性和容纳性。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西方的绝对衰落和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瓦解，而是呈现出西方主导权在结构上出现松动和漏洞，在各方面都需要与新兴大国分享。

如果我们解剖西方的结构性主导权的内容，就可以看到西方结构性主导权的四大力量——即安全与国防能力；对生产、货物及服务系统的控制；对金融和信贷结构的控制；对知识和思想的垄断性统治。我们还可以看到西方在五大领域享有主导性的垄断地位——即科技、工业和军事；金融规则的制定；在世界范围内攫取及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媒体和传媒（观点和价值）；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五大领域都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松动和多元化，主导权日益向相互依存的共享方向发展。

新型的相互依存式主导权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相互依存主导权下国家利益的考量和成本—收益的分析成为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主要动机，而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联盟。第二，相互依存主导权不是基于单一国家的领导，更不会趋向于以一个核心为中心（西方）建立规范和价值观的普世化。第三，相互

^① 参见 John Mearsheimer,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Vol.105, No. 690 (April 2010), pp. 160-162; John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4, 2006, pp. 381-396.

^② Michael J. Green, and Daniel M. Kliman, "China's Hard Power and the Potential for Conflict in Asia," *SERI Quarterly*, Vol. 4, No. 2 (April 2011), pp. 33-41.

依存主导权意味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有一个明确意识，没有试图“替代主导权”，而是以一种平衡的方式，提高多边主义或避免美国的单一主导权和西方的普世性垄断。第四，相互依存主导权对中国和新兴国家来讲，是试图通过区域相互依存而形成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来制衡以美国主导权下的全球治理。第五，主导权以相互依存的形式存在，是为了“克服”自身的限制。在笔者看来，“相互依存式主导权”将主导这个时代的世界秩序。在国家利益、利益集团、地区走向、共同政治议程、政治联盟以及潜在冲突的关联中，“守成国”和“崛起国”相互交织于一个塑造并重塑国际秩序的持续进程中。

透过“相互依存主导权”的棱镜，我们不难看出，中欧在国际格局转型中的相互依存多于对手成分，但中欧安全博弈在主导权相互依存加深的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挑战。自2003年中欧双方决定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欧关系在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时，中欧安全博弈也在新旧交织的不同领域全面展开。各种政治、安全、经济、意识形态的矛盾层出不穷，而且相互影响和排斥，如诺贝尔和平奖风波、中东和平、伊核问题、碳排放问题、知识产权等。

（二）社会化理论与相互依存式主导权

无论是“国际社会化”还是“国际社会化的双向互动”，作为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社会化”议题，都是将社会性因素（特别是非物质性因素）以及社会学、心理学、认知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思想和理论融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这些社会性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国际政治环境的社会属性、引起国际关系变化的社会性动因与机理以及国际体系演进所可能带来的社会性影响。而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上述社会性思想与理论，其关注的焦点或曰国际问题研究的切入点在于国际关系实践中的“互动”和“进程”。进一步说，国际社会化理论较强的解释力主要在于对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交往互动的微观进程的讨论中。

1. 国际社会化的双向互动

作为理论的“国际社会化”（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在建构主义，特别是规范研究的框架下，有着系统的论述。^①而国际社会化的双向互动（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s a two-way process）则是在新兴国家崛起、全球权力东移的时代背景下，关于如何塑造国际规范、建构国际制度、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等现实世界政治议题的替代性解释。^②就上述微观进程的讨论而言，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化理论主要聚焦于以下两个维度：一是体系（或曰结构）的维度，即国际规范的塑造与

^① 参见 Jeffrey T. Checkel, e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Xiaoyu Pu, “Socialization as a Two Way Process: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4, 2012, pp.1-27.

扩散（传播）以及国际制度（机制）的创立与运行；二是单元（在大国博弈的讨论中主要指国家）的维度，即国家间的互动与国家身份、偏好与政策选择的形成与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体系的维度还是单元的维度，既有的比较成熟的关于国际社会化的研究，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国际规范塑造、国际制度建立以及国家间关系发展初始状态的讨论：即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交往互动微观进程存在理论缺陷。

就体系的维度而言，为了分析与研究的便利性，既有的国际规范或国际机制、国际制度被想当然地当做了“教化者”，而国际关系中的“单元”或者说大国关系中的国家，则成为被教化的对象，即“学习者”。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就指出，“国家社会化指国际体系通过无政府状态的过滤效果和试错学习，使安全自助和权力平衡政治的基本规范成为国家的行为方式”。^①自由主义学者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和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 Kupchan）在《社会化与主导权权力》一文中主张，“社会化是主导国行使主导权的软权力方式”。^②在他们看来，国际社会化可以定义为其他国家领导人，在主导权体系下内化主导国所倡导的规范和价值观的过程；这使得由主导国和其他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接受主导国的领导地位，使主导的世界体系得以维系。而建构主义者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和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ink）则主张，“社会化是指通过物质惩罚和类似于国家之间的伙伴压力的综合作用，使国际体系中的新规范得以被国家所接受的积极机制”。^③综合上述关于国际社会化有代表性的论述，不难看出，就体系的维度而言，在国际规范与制度的初始建构中，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交往互动的微观过程并没有得到社会性的呈现与社会化的解释。

就单元的维度来说，大国博弈与大国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化讨论，通常被冠以“国家社会化”^④的概念。卡伊·奥尔德森（Kai Alderson）把国家社会化定义为国家内化产生于国际体系他处（elsewher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的国际规范的过程。^⑤杰弗里·切克尔（Jeffrey T. Checkel）借鉴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关于社会

①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 G. 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13 (Autumn 1990), p. 289.

③ [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334页。

④ 关于国家社会化的概念，有的学者称之为国家社会化（state socialization），如卡伊·奥尔德森（Kai Alderson）；另有学者称之为或国际国家社会化（international state socialization），如彼得·霍华德（Peter Howard）。

⑤ Kai Alderson, "Making Sense of State Soci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7, No. 3 (July 2001), pp. 415-433.

化的经典定义,指出“国家社会化是使行为体接受某团体的规范和规则的过程。其结果是持续遵守这些被内化的新规范。接受团体规则,意味着行为体由遵从结果性逻辑转向适当性逻辑。这种接受是持久的、社会性的,不受外部物质性奖励、刺激或惩罚的影响”。^①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Iain Johnston)以中国与国际机制为研究对象,指出“社会化意味着国际社会既有的主流价值观念、角色身份和理解被国家所接受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简言之,国家社会化的核心逻辑在于,国家的政策选择与偏好是因为做某事是正确的,或因为这么做符合其国家身份的建构,而不是这样做会带来物质性或社会性的好处”。^②从单元的维度出发,以国家为中心的社会化微观过程得以学理的呈现,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之间互动的社会性逻辑仍旧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因此,笔者在此提出“国际社会化双向互动”的理论视角,其主张可以概括为:第一,国际社会化的内容是国际体系规范。国际社会化是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交往互动,塑造国际规范,并在持续交往互动的进程中形成能够被认可、被接受的国际社会期望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的过程。第二,国家社会化的基本途径,是通过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双向的交往互动实现的。国际社会化的双向互动理论不强调国际社会变化与国际格局演进中的权力与不平等性。第三,典型的国际社会化的双向互动是国家之间持续双向互动,即博弈冲突又和谐共生;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相互协调,共同推进国际关系发展。

2. 社会化理论与中欧大国博弈:朝向共赢共生、合作安全

在笔者看来,国际社会化的双向互动反映在中欧博弈中,就是中国和欧盟分别以社会化的方式融入国际体系,进而在国际体系中进行中欧之间社会化的双向互动,并以此社会化互动影响国际体系发展(即国际格局演进)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就融入国际体系而言,中国与欧盟是共生的关系;而对于中欧之间的双向社会化互动而言,中国和欧洲构成了大国博弈的进程。因此,在国际社会化的双向互动视角下,中欧大国关系建构了共生与博弈的互动联结。2013年世界主要大国完成政权交接之后,新一轮国际安全博弈对于塑造未来的安全格局显得尤为重要。更进一步说,关于中国崛起,西方最大的疑虑在于,中国究竟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一个谋求改变现状的国家还是一个主张维持现状的国家?是一个进攻型的国家还是防御型的国家?在笔者看来,在国际格局转型、“相互依存式

^① Jeffre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Autumn 2005), pp. 801-826.

^②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主导权”这一理想图景逐渐显现的今天，中国的角色定位首先应该是一个日益成长的社会型国家。即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同国际社会保持着紧密的社会化互动关系；而这一社会化互动关系也加深了中国在大国崛起中对国际社会的依赖性。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化互动给中国崛起带来了脆弱性。诚如李光耀所言：“中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的，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成员。这种接受本身就为我们这个世界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①

但是，中欧之间的安全博弈作为国际安全格局转型中双向的互动进程，极易受中欧双方内政问题以及外部大国因素的影响。欧洲尚无法作为一个整体采取对外战略行动，而欧洲经济社会形势的复杂多变又进一步导致欧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明显下降，这分散了欧洲国家对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利益诉求，进而加剧了中欧安全博弈的不确定性。^②当前“欧债危机”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欧盟要恢复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其内部正面临着艰难的治理、产业和社会转型。在政治领域，正如英国《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主编托尼·巴伯(Tony Barber)所言，“欧洲的政治体系正面临‘合法性危机’”。^③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更是在经济危机伊始就直言，“欧洲作为21世纪一支重要国际力量的时刻，甚至尚未开始就已然宣告结束了”。^④就中欧博弈而言，欧盟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困境直接影响了中欧博弈的国际进程。与此同时，中国与欧盟作为两支重要全球力量，二者之间的博弈互动，无疑会对世界，包括中欧博弈进程的本身带来重要影响。中欧双方在相互博弈中实现相互依存与和谐共生，共同建构“相互依存式主导权”的国际安全格局，保障国际安全。

四 应对中欧安全博弈新常态：国际安全的规范重塑与机制建设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明显变化以及国际安全格局的加速调整，世界秩序主导权的相互依存使得国际规范的结构布局也处于持续的调整期。国际规范的结构布局主要由国际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以及主导国际行为规范(或准则)构

^① 李光耀口述、[美]格雷厄姆·埃克森、[美]罗伯特·D. 布莱克威尔、[美]阿里·温尼编：《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② 以2013年以来发生的乌克兰危机为例，面对俄罗斯的强硬表态，欧盟内部不同国家之间出于各自国家利益考虑，其外交态度与行为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性。

^③ Tony Barber, "Europe must confront crisis of legitimacy," *The Financial Times*, April 23, 2012, <http://www.ft.com/cms/s/0/4e2c793c-8d50-11e1-8b49-00144feab49a.html>.

^④ Richard Haass, "A waning Europe matters less to America," *The Financial Times*, May 13, 2010, <http://www.ft.com/intl/cms/s/0/812069a4-5e25-11df-8153-00144feab49a.html#axzz3Lx6NzZ94>.

成。^① 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由西方国家塑造的主流价值观以及其所制定和执行的主导行为规范也受到一定的挑战，西方国家在国际规范结构性布局中的强势地位日渐松动。

（一）中欧国际安全规范的重塑进程

如前所述，虽然欧盟在很多方面被赋予了“规范性的权力”，以“后主权”、“负责任主权”^②和“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为代表的国际关系新理念的出炉，也确实给中国等重视“主权”的国家以很大的规范压力和话语霸权。但是面临欧元危机与欧盟内部多元化的挑战，欧洲的理念不得不重新向主权回归。欧盟内政的困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欧盟规范性权力的运用。尽管欧元危机、欧盟的多元化趋势以及欧盟成员国的分裂运动（以“苏格兰独立”为代表的欧盟成员国中央与地方的分离趋势以及英国内部对欧盟不满的呼声此起彼伏）是否已经严重到逆转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或者究竟给一体化造成了多大冲击尚无明晰的判断；但欧洲个别国家面对危机，重新向主权回归，欧盟的外交政策也退守到其周边地区。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欧盟对外行为的一致性与欧盟对外行为的有效性，使得欧盟无暇顾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更远的东方。以此为契机，国际格局转型期的中国对欧洲外交，应当有所作为地开启国际安全领域“规范重塑”的进程。早在 2012 年 9 月，在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第 15 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前夕，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吴海龙大使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欧要“构建政治上成熟稳定、模式上并存不悖、发展上相互借重、人文上互鉴共荣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③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对中欧关系的阐释，主管欧洲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宋涛早在 2013 年初就强调，“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集团，中欧应当也可以建立起互尊互鉴、全面合作、共同繁荣的新型伙伴关系。”^④

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年来的历史进程，也是双方在博弈中超越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的过程。因此，以“中国梦”为契机，通过同“欧洲梦”的文明沟通与对话，在中欧博弈中借助规范重塑的进程、把握国际共进中对话协商

^① 值得注意的是规范重塑的进程不同于观念互动的过程。规范的重塑在凝聚国际社会观念共识的基础上，有着极强的建构功能；在思想、规则基础方面，决定着未来国际格局的走向。

^② 关于“负责任主权”的概念及其演进，参见毛维准、卜永光：《负责任主权：理论缘起、演化脉络与争议挑战》，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42-63页。

^③ 《构建全面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型中欧伙伴关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谈第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2-09/18/c_113109570.htm。

^④ 《中国发布对欧洲外交新战略》，载《东方早报》，2013年4月3日，<http://www.dfdaily.com/html/51/2013/4/3/972726.shtml>。

的方式，尽最大努力消解困扰中欧关系发展的思想隔阂与误解。^①

（二）中欧国际安全的机制建设

无论是在国际安全理论上，还是在中欧大国博弈的实践中，雄心勃勃的国际安全目标都是经由机制建设而得以在可操作的层面实现。就保障国际安全而言，各层次的政治对话机制以及多边、双边的安全合作机制在应对中欧安全博弈新常态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通过多边或双边的安全合作机制，中欧双方可以实现维护各自安全利益，共同应对外部安全压力，并能够实现国际安全格局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渐进式变革。

就中欧关系的现实发展而言，中欧双方都具有追求多边主义的政治倾向。中国正在和欧洲构建稠密的双边、多边机制网络。中国参与欧洲的安全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将担负国际安全责任，并惠及欧洲的和平发展。2003年，中国和欧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为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明确了方向，并提供了开展合作的具体机制框架。然而，针对欧洲国家的增信释疑、努力构建战略互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将是中国运筹中欧关系的首要任务。在过去的十年里，中欧双方逐步建立了年度领导人会晤和政治、经贸、人文领域三大合作交流机制。建立了六十多个政策对话与合作磋商机制。诚如傅莹所言，“欧洲国家是西方阵营内率先承认和接触新中国的国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合作伙伴，欧洲国家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获得丰厚的回报。现在中国与欧盟已经建立起各种层次的对话机制，覆盖60多个领域。”^②

“‘相互依存式主导权’视阈下的社会化”理论主张，在中欧安全机制的建设中，崛起的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是平等互利的关系，而非作为一个域外强权利用这些机制来参与和影响欧洲地区的安全事务。未来的中欧安全博弈，中国要适应欧洲体制机制多层次的特点，努力建设覆盖国家—市场—社会三个层面的社会化互动国际机制，同时打造兼顾多边和双边、政府和民间、区域和次区域等形式多样的合作机制，以应对未来中欧安全的挑战。在机制建设中，保持对话，

^① 长期以来，困扰中欧关系发展的思想隔阂与误解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根源，举例来说，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就宗教传统而言，欧洲的基督教历史、契约与法制传统，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仁治礼法传统有着根本的矛盾。就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冲撞与纠结来说，欧洲作为海洋文明的代表，向来崇尚自由竞争，而非中国文明的秩序与和谐。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令欧洲十分困惑，如国家对市场的作用、私有制问题、人民币问题、民主与发展问题等等。中国常常遭到“不民主”、“不自由”、“不讲法治”的指责，中欧经济博弈中，长期困扰中欧的“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至今没有可能得到解决。

^② 《外交部“蓝厅论坛”聚焦新形势下中欧关系发展》，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2/02/c_111212717.htm。

增进互信，以畅通的多层次的沟通渠道，特别是强化与非欧盟成员欧洲国家的关系，破解中欧安全博弈、中欧关系未来发展中的困局。

五 余论

当前，中国和欧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十年。在国际安全格局转型的大背景下，中欧之间的大国博弈与互动也正在面临一个比较微妙的新常态。在国际安全领域，中国对欧外交，既面临着“变动中的欧洲地区实力与世界地位”与“上升中的中国国际地位”双重机遇，也面临着“新兴崛起的大国”对“既有规范性力量”，特别是以“中国梦”为代表的“复兴的东方传统文明”对“滥觞的西方普世价值”^①的双重挑战。然而，就中欧关系的发展、中欧安全博弈的前景而言，在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客观背景下及中国深度融入现行世界秩序的努力下，双方也确实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相互心理磨合和相互适应时期。因此，共同挖掘中欧双方在维护国际安全中的共同利益，使中欧安全博弈的主题从“硬摩擦”与“软博弈”不断走向相向而行、融合共生。值得注意的是，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中，中欧关系是中国外交最重要的着力点之一。中国新领导集体对欧洲外交战略的表述也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新理念一脉相承。目前，中国与欧盟国家正把握“互利共赢”的大势，积极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针对中欧关系中的“硬摩擦”，双方应加强在贸易等关键领域的风险管控，加强经济领域的“联姻”。而应对中欧关系中的“软博弈”，双方应在多边及全球事务中加强协调，通过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提出“中国梦”、“共赢共生”、“新型义利观”、“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进一步密切中欧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的伙伴关系。

未来国际安全格局的理想模式应该是：从冷战后的“一超多强”格局演进为大国之间竞合博弈中的“多元共生”动态格局，通过建立“相互依存式主导权”的世界秩序，保障国际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通过带动欧洲同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欧大国博弈有望为未来国际安全格局的塑造作出重要的贡献。

【收稿日期：2014-11-02】

【修回日期：2014-12-15】

【责任编辑：苏娟】

^① 此处“滥觞的西方普世价值”主要是指那些鼓吹“历史的终结”“欧洲中心论”等具有典型西方（欧洲）中心主义的提法、观念和符号。